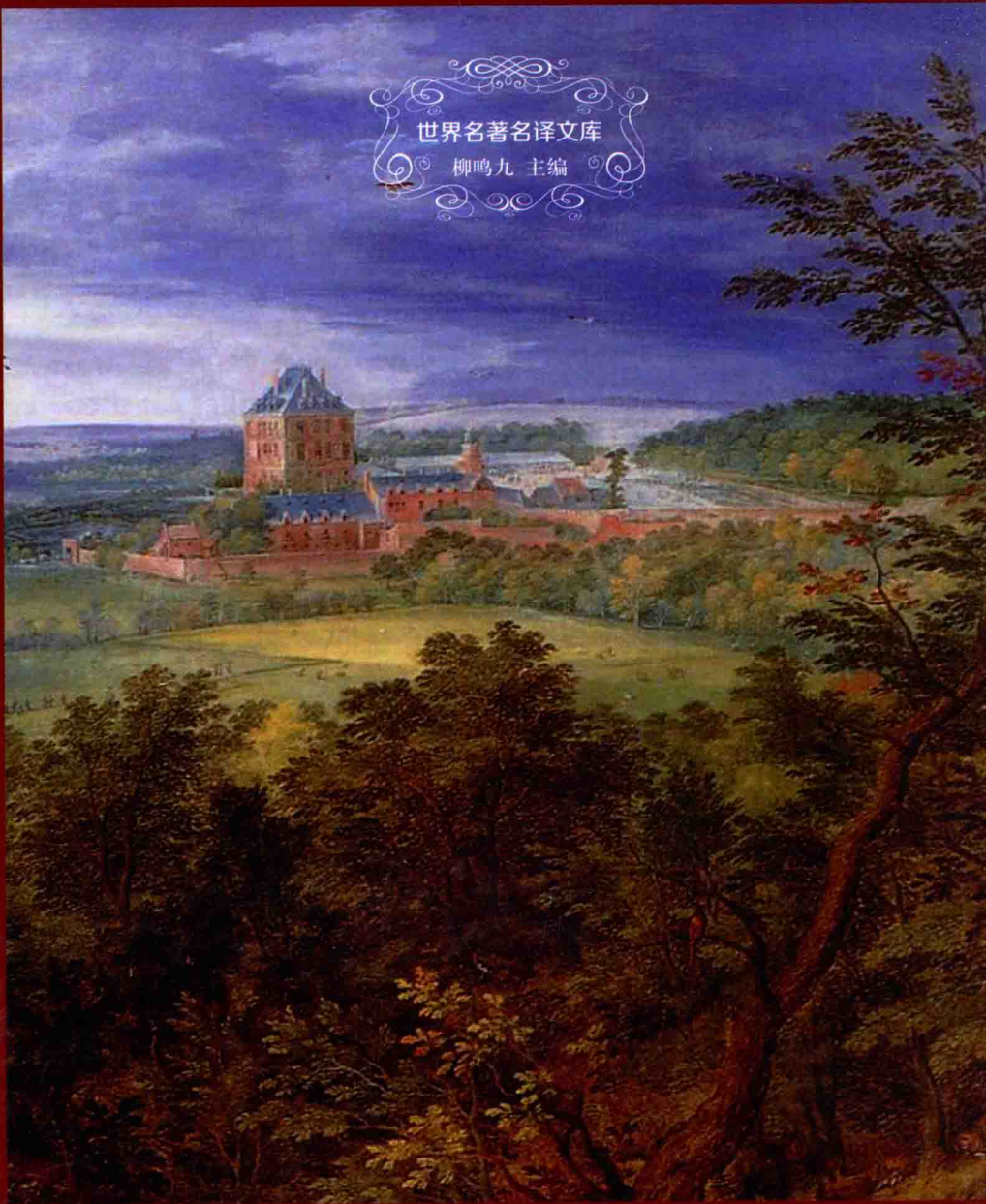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司汤达集 03 罗新璋 编选

意大利遗事

〔法国〕司汤达 著 李健吾 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司汤达集 罗新璋 编选

意大利遗事

〔法国〕司汤达 著 李健吾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大利遗事 / (法) 司汤达著; 李健吾译. —2 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8
ISBN 978-7-5426-4905-8
I. ①意… II. ①司…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1292 号

意大利遗事

著 者 / [法国] 司汤达

译 者 / 李健吾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娜 日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24 千字

印 张 / 23.5

ISBN 978-7-5426-4905-8/I · 938

定 价: 28.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兴 安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

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

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

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译本序

司汤达的真名实姓是亨利·贝尔，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他生在法兰西东南靠近意大利的一个重要省会格勒诺布尔。虽然有四十多年活在十九世纪，虽然参加了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在法兰西是最早、最激烈的战斗员^①，但是他的基本精神，却属于十八世纪战斗的唯物论的文学传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的大师们，才是他的真正师承。

他曾经告诉一位英吉利朋友：

“世上只有两种真正的科学：

“一：认识人们行动的动机的科学。你一认识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你就能设法促使他们完成结局对你**是幸福的行动**。在一八二二年，人们谈起他们行动的真正动机，几乎是永远在撒谎。对于一个年轻人最有用的科学、证明他在二十岁上最有才情的科学，就是戳破这类谎话的科学。真正的政治只是使甲先生不在像害乙先生的行动之上建立他的行动的方法而已。有一本书，题目应当是：发现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的方法。这本书就是爱尔

^① 司汤达在一八二三年发表《拉辛与莎士比亚》小册子，受到学院派的攻击，他在一八二五年发表第二个小册子，加以反击。这时候，浪漫主义在法兰西还没有成为运动。

维修的《精神论》。

“二：第二种有用的科学，就是**逻辑**，或者是我们走向**幸福**而不发生错误的方法。”

这第二本书，他告诉他的朋友，就是德·特拉西的《观念学》^①。

对于司汤达，追求快乐是人生终极的目的，同时，也是可以追求到的。他从他的唯物观点出发，认为宇宙不是一个谜，只要我们肯去认识，而又掌握得住认识的**科学**或者方法，永远尊重**事实**，真理或者幸福在最后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说：“彻底认识人，正确批判事物，这样，就是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② 有这种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做他的依据，司汤达的思想，无论是表现在生活上的，或者是著述上的，显然就具备着高度进步的倾向。这是他和他的同代作家最不相同的一点：他从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是挑衅的、战斗的。活着比他声誉高，然而比他年轻的大作家，例如雨果，一开始是保王党、天主教徒，同时在写作风格上是描写的、抒情的；又如巴尔扎克，虽然对司汤达曾经表示衷心的钦佩，然而却是右倾的，在政治思想上反而不如雨果能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司汤达在小说家之外，还是批评家、游记家、自传家，然而即使是写游记，他也从来不是描写的；即使是写自传，他也从来不是抒情的；显然他是那样敏感，而且感情那样容易激动。他不仅敢于在他的游记或者小说中攻击教会、教皇本人，而且还在教皇辖地，即使分析自己，他也永远是坦白从事、

① 一八二二年六月十日，与苏东·夏尔普书。

② 一八〇一年十二月十日，司汤达的《日记》。

绝不客气^①。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高尔基很早就肯定了他的倾向性：“我读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在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他那沉静的语言、怀疑的嘲笑，大大地坚定了我的憎恨。”^②

司汤达活着的时候，在文学事业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重视。他活在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复辟的王朝，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并驾齐驱的时代。列宁曾经这样肯定十八世纪末叶法兰西唯物主义者的战斗作用并指出：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因此，民主派的仇敌就极力企图‘驳倒’、摧毁、诬蔑唯物主义，而拥护那些归根到底总是辩护宗教或维持宗教的哲学唯心主义派别。”^③

我们可以想见，到了十九世纪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民主派的仇敌”变本加厉，何等猖狂。夏多布里昂用富丽的词句歌颂天主和神秘，在罗马做大使；德·麦斯特，在更远的莫斯科做大使，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要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教皇之下、一个国王

① 梅里美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坦白是贝尔性格的特征之一。没有人比他更忠诚，做事更可靠的了。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文人，在批评上更直率，而又勇于接受朋友的批评的。”

② 高尔基的《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引自《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本。

③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引自《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中文译本。

之下，而且“无论如何，不应协助将知识普及于下层人民。”^① 司汤达拒绝看夏多布里昂的杰作《阿达拉》^②，预言到一九一三年，就要没有人读他的书^③。至于德·麦斯特，司汤达干脆骂他是**坏蛋**，不然也是**懦夫**，从第一页起就在撒谎。^④ 然而像司汤达这样一个在巴黎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苟全性命于意大利的小领事，除去忿懣、郁怒，实际上是孤独无力的。他给我们留下十四篇遗嘱，这就是说，他当时起过十四回自杀的念头。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两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五年四篇，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〇年各一篇。尽管绝望，他还是没有自杀。他永远和**唯我主义者**的“我”斗争着。他永远在和丑恶的现实，在和造成这个现实的不合理的制度战斗着。在他几次想到自杀的这些寂寞、悠长的岁月里，他写着他的杰作，他发表了他的部分写作，不多的读者在读他，最后，他得到了巴尔扎克的赞扬，说他是“观念文学最卓越的大师之一”^⑤。他写信给巴尔扎克表示感谢，说：“我梦想在一八六〇年或者一八八〇年左右，我也许要得到若干成功。”他对自己的期许，和他某些其他预言一样，历史证明他不但不狂妄，反而完全正确。他深信未来属于他，属于《高老头》的伟大作者，而不属于那些扬扬得意的

① 参阅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引自人民出版社的中文译本。

② 一八〇一年六月十七日，司汤达的《日记》。

③ 司汤达常常喜欢说些预言，奇怪的是，往往灵验。在政治上，他曾经预言，拿破仑的帝国要在法兰西再来一回，意大利要在一八四八年左右发生革命。最灵验的是他对于自己的文学事业的预言，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了，因为他公开写在给巴尔扎克的信中。这很可能都是正确分析事物、实际掌握辩证法的结果。

④ 参阅德莱克吕日的《六十年回忆录》，或者汝尔达的《见过司汤达的人们说起的司汤达》。

⑤ 巴尔扎克的《贝尔先生》，引自《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

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一种不屈不挠、乐观而清醒的战斗精神是他的生命的原动力。

在“仇恨迷信和虚伪习气”上，司汤达比前辈伏尔泰走得远多了。他的年轻要好的朋友梅里美回忆他道：“我从来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得来他的见解，谈起一个问题来，他不幸几乎和每一个人的看法相左。”他的一个格言就是永远不饶恕谎话。在《红与黑》正文开始之前，他放了一句丹东的话：“真实，严酷的真实”，说明全书的意图。对于司汤达，“道德，就是增加幸福；罪恶，就是增加祸害。此外一切，只是虚伪或者资产阶级的愚妄。应当永远抓住机会教育青年”。^①他自己出身于外省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是他“对一切有关资产阶级的事情，具有最深沉和最不掩饰的蔑视”。^②在《红与黑》里，尤其是在另一部遗著《吕西安·娄万》里，他对外省和巴黎的资本家做了毫不容情的告发式的批评。

他更猛烈的鞭挞是在宗教和封建制度方面。一时他说，“我以为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③一时又说，“贵族和神甫，是一切文明的大敌”。^④梅里美记述道：“他从来不能相信世上有真正信徒：一个神甫和一个保王党对他永远是伪君子。”^⑤在另一个地方，更确定道：“他是一个极不信教的人，一个病人膏肓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正确些，上帝本人的仇敌……他否

①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一日，与友人书。

② 德莱克吕日的《回忆录》。

③ 引自司汤达的《意大利拾遗》中的《旅客与妇女》。

④ 一八一八年四月十四日，与友人书。

⑤ 梅里美的匿名小册子《H.B.》。他的别的话，不再加注释的，全引自他的《回忆录》。

认上帝，可是恨起他来，就像恨一个主子一样。”我们晓得，说到最后，伏尔泰是一个泛神论者，而司汤达根本把上帝当作他的仇敌。德莱克吕日记录他这方面的议论道：“就算有一个上帝吧，可是哪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过上帝是善良的啊？什么！你希望我爱戴一个创造鼠疫和疥疮的上帝？为了叫我受罪，一步给我来一个陷阱的上帝？叫我生下来就害病，这是怎么样的上帝？”为什么德·麦斯特是**坏蛋**？因为“他做的正是所有叫花子神甫做的。他们拿空洞的观念代替事实，因为事实不像观念那样讨人喜欢。事实是可以测，可以量，可以证明的”！高尔基在《底层》中所痛恨于香客路卡的，正也是因为他专拿谎话安慰人或者哄骗人。

所以，就在夏多布里昂歌颂天主的伟大的慈悲和织绘中世纪修道院的假想的静修生活的时候，司汤达把圣母的无灵和地狱一样戕害青年心灵的修道院摊给人看。在这一点上，《意大利遗事》^①有着它的特殊的反抗的意义。它的尖锐的斗争意义就在于它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像司汤达自己说起的，他爱过这些真实

① 《意大利遗事》不是他亲手编订的短篇集。由于编订者取舍不同，篇目往往因人而异。中文译本根据的是亨利·马尔蒂诺先生的勒·狄望版本（一九二九年）。《法尼娜·法尼尼》是最早的一篇，一八二九年在《巴黎杂志》发表，取材于同代生活。取材于十八世纪的有两篇遗作，一篇是《圣·方济各在里帕教堂》，一八五三年问世；另一篇是没有完成的《苏奥拉·斯科拉斯蒂卡》，这是他的绝笔，前一天他还在写它的小序，几小时后，他就倒在街头中风死了。它和世人见面迟到一九二一年。这三篇的时代背景显然不属于十六世纪，但是人物仍然继承着它的敢作敢为的传统，所以编订者就把它收入《意大利遗事》。除去《昵之适以杀之》是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之外，其他全是司汤达生前发表的作品。《维托里亚·阿科朗博尼·布拉恰诺公爵夫人》在一八三七年三月发表，《泰奇一家人》在同年七月，《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在一八三八年发表。最后也是最长的一篇是《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在一八三九年问世。

的贵族家庭历史的记述，是因为这里打上了“司法的铁掌”的铭记，而且在受害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血还是热的，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伪造历史之流，如夏多布里昂的最好的回答。在这些真实故事里，受难的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膜拜的圣母和圣者，而是被它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制度所“压坏了”的呼唤无门的男女。高尔基在这上面把他最深刻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熟悉好几千本描写秘密的与流血的罪行的小说。然而我阅读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的时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这种事怎么做得出来呢？这个人所描写的本是残酷无情的人、复仇的凶手，可是我读他的小说，好像是读《圣者列传》，或者听《圣母的梦》——一部关于她在地狱中看到人们遭受的《苦难的旅途》的故事。”

统治阶级，无论是在巴黎、维也纳或者罗马，当然是讨厌这种翻旧账的作家的。年轻时候，屠格涅夫游览罗马，请司汤达给他做了三天向导，当时写信给朋友道：“这位聪明的法兰西人，是最好的向导：他对古代罗马和现代罗马同样熟悉，而且在我面前高谈阔论着。由于他，我晓得了罗马一个大概 Ansichten，它的内部情形，它的实际政策。他说的真话同调和这些真话的漂亮话，反而使这里人不喜欢他，不过，就我看来，实际上对的是他。”^① 法兰西政府把他派在意大利一个小港口做领事，赏他饭吃，主要是欣赏他已经“一半意大利化”了，大使馆利用他做做参考而已，其实是没有人喜欢他的。^② 教皇的警察一直在暗里尾随他，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政府干脆就不许他逗留。他在

① 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屠格涅夫与维阿仁斯基书，见于汝尔达的辑录。

② 斯帕什的《回忆录》，见于汝尔达的辑录。

意大利写一封信几乎换一个笔名。很可能他是世上用笔名最多的人了，已经晓得了的就有一百七八十个。然而他不要沉默。他的表弟高隆^①回忆他道：正相反，他有勇气坚持、维护他的见解，反对任何人。

他热爱意大利。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在十七岁上随着总裁时代的法兰西大军，“通过最困难的白雪皑皑的圣·倍尔拿山隘，通过谁都没有料到的地方，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进意大利北部”。^②帝国崩溃以后，他到米兰住了七年，直到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二一年，意大利发生革命，奥地利警察认为他言行可疑，不许他继续居住为止。他在这里接触到烧炭党的革命活动，他在《法尼娜·法尼尼》这篇小说里，刻画了这样一个献身于资产阶级祖国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看到他喜欢的歌剧，体会到他讴歌的**激情·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各方面所表现的**力量**。作为契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他寂寞的晚年。他死在巴黎，墓碑是用意大利文立的，上面写着：“米兰人，活、写、爱，膜拜契马洛萨、莫扎特和莎士比亚。”他的全部感情生活用这寥寥几个字表现无遗了。

然而他爱他的祖国——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人民阵线曾经出现了一些真正英雄，到了帝国时代，安于逸乐的将军们贪生怕死，真正英雄只有到广大的士兵队伍里面寻找。紧接着就是一个更坏的时期，波旁王朝在外国人卵翼之下回到巴黎又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红与黑》的时代，主人公于连就是这样一个虚糜

① 高隆，司汤达最忠心的朋友，一八五五年全集（并不完全）的编订者，他的司汤达的《行传》是研究司汤达的主要资料之一。

② 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一四一页（人民出版社）。

人力，前途黯淡的时期产生的。红——军人；黑——教士。可是来到一八三〇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于连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力无用处时代。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八三〇年的法兰西是一个辱没法兰西大革命，不配称为大国的祖国。一八四〇年的法兰西政府接受了《伦敦条约》，放弃支持埃及的一贯政策。领事馆一个属员后来写信告诉高隆说，司汤达就是从这时起才坚决在遗嘱上把自己叫作米兰人的：“把自己叫作法兰西人，我现在害臊。”^① 除非到下层找去，否则，力量在法兰西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八三四年前后，他在意大利见到一批旧写本，讲的全是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家庭的变故。他感到极大兴趣，花钱陆续誊了十四本，认为这些逸事可以补充十六、十七世纪正史的不足：“正是这些风俗，产生出了许多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这些大艺术家不是教皇或者霸主谁某奖掖出来的，“不是什么学院和美术学校在今天可以再生出来的”。^② 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在这一个阶段的自然应有的收获。他看出这些逸事可以写成“攻击教士的方式”。这是他为《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规定好了的政治任务。^③

而更结合着他深沉的喜爱的，是通过这些杀人流血的上等社会的阶级成见，暴露出了人性本身所含的力量。这里贯穿着最原始、最基本、最粗野的反抗情绪：不甘于被教会和封建制度牺牲

① 布奇与高隆书，见于汝尔达的辑录。

②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勒法法色尔书。

③ 写在司汤达收藏的写本上，见于《意大利遗事》编订者亨利·马尔蒂诺的引言。